

用和目的，不否定“三区革命”是一次自主的民族解放运动，就不可能在反分裂理论和政策上有实质性的进步。这不利于对分裂势力的打击，不利于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不利于对广大群众的教育。

最后强调一点：近年来，分裂主义对国家主权和国际秩序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受分裂主义威胁的国家不断增加，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内的分裂主义更加活跃，反分裂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新疆近一时期的工作，对分裂主义进行了有效遏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中，以前所未有的坚定态度表达了反对分裂主义的决心。这些因素为否定“三区革命”是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内外环境。应该抓住这一时机，对反新疆分裂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实质性的推进。

## 【译 文】

### 1946-1949 年苏联的新疆政策<sup>1</sup>

贾米里·哈桑雷著，杨恕编译

按：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外蒙古的利益诉求得到保证后，在苏联干预之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代表与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签署和平协议，并于1946年7月正式建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苏联在新疆的权益也得到了保证。但是在麦斯武德被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以及联合政府解散后，苏联重新加大了介入新疆事务的力度。期间，随着中国国内解放战争进程的加速，苏联在得到中国共产党新政府将实行亲苏政策的保证后，促使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帮助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对于上述历史，阿塞拜疆学者贾米里·哈桑雷在他的专著《苏联政策中的新疆》中，结合苏联相关档案资料进行了详细研究，现将相关内容编译如下。

#### 一、新疆联合政府运转期间苏联的新疆政策

1946年6月6日，一份由11项条款及两份补充组成的协议《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正式签署。协议的签署以及整个谈判过程都处在三区革命活动负责人叶格纳洛夫将军的监视之下。苏联国家安全部反间谍处处长彼·费多托夫关于叶格纳洛夫给莫洛托夫写道：“1945-1946年间，他领导了伊宁人反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同样还有与中国人谈判的政治策略”。

协议文本中清楚写到，中国方面不仅不承认“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组织，而且还以协议生效后解散伊犁政府、并在其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为目标。尽管协议承认当地民众享有某些民族-文化权利，但没有赋予其地域或者文化方面的自治权。伊宁代表的唯一收获就是根据协议第10条保留了“民族军部队”，但其人数还不能超过1.1-1.2万人。苏联方面清楚地知道，伊

<sup>1</sup> 本文刊载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主编《新疆研究通讯》第6期，第8-31页。

原著：Джамиль Гасанлы, 2015. *Синьцзян в орбите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талин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Восточном Туркестане (1931-1949)*.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宁政府首脑——艾力汗·吐烈是落实和平协议的最大障碍。因此，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为避免他将来可能采取的某些行动”，6月16日深夜至17日凌晨，吐烈被带入苏联境内。吐烈的助手阿莱丁·阿穆尔及索努尔·穆尼尔（两人在伊宁一直生活到晚年）是这样回忆事件经过的：“7月12日（此处应为6月16日——作者），我们和吐烈一起来到2号房子（苏联在伊宁情报机构的秘密驻地）。房门打开，吐烈由人陪同走了进去。过了一会，门内走出一人让我们离开。我们于是就回来了。此后我们再没见过艾力汗·吐烈，不知道把他带到哪儿去了”。

在6月16深夜-17日凌晨时分，叶格纳洛夫从阿拉木图向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罗夫及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报告说，东突厥斯坦政府前任主席艾力汗·吐烈·沙吉尔霍扎耶夫已被带入苏联境内。6月19日，相关部的负责人将该消息报告给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在当天发往内务部及国家安全部的第2份通报中，叶格纳洛夫给这些部的部长们写道，已从新疆撤出早前派去帮助伊宁政府的全体人员，收回了起义军的武器。同时，在叶格纳洛夫和朗方格（苏联国家安全部第一局第4处处长——译者）从新疆发来的一份通报中说：担任新疆新政府副主席一职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此时已来到了伊宁。在民族主义团体看来，哈斯木“在自己政治工作之中只遵循苏联的政治观点”。根据苏联相关机构的安排，他此次前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按照乌鲁木齐协议终止东突厥斯坦政府及整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活动。6月28日，召开了最后一次东突厥斯坦政府会议。在会议上正式宣布停止政府的职权并终结共和国的权力。就这样，中国边疆的东突厥斯坦、尤其是它北部命运之中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事件后来的发展情况表明，新疆突厥-穆斯林民众成为了莫斯科推行其政策的工具。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克拉西里尼科夫曾公道地指出：总之，新疆民众在苏联领导进行的一场与中国的政治大博弈中，只是一张可以用来交换的牌。

与中国政府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苏联就在寻找各种方法以保持自己在新疆的影响。在这方面，莫斯科尤其重视1945年底成立的人民革命党的组织机构的组建，重视增加其大众性。领导该党的是以亲苏著称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乌斯曼·尤苏波夫撰写了该党党纲草案并把它发给了莫斯科。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则编订了党纲补充草案，交给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处负责人米哈伊尔·苏斯洛夫。1946年6月26日，苏斯洛夫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负责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写信说，他已经将尤苏波夫起草的党纲草案与两个强力部门的草案进行了比较，并以尤苏波夫草案为基础对某些条款进行了修正。他写道：“在‘争取政治自由及国家制度’一章中应该说：给予新疆国内自治权并不排除中国对该省的主权权利。如果党纲中不提这一点，那么考虑到过去及当前新疆与中国中央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排除这会成为该党合法地位、登记及活动等问题复杂化的原因”。因此，苏斯洛夫建议党纲上述部分第一条采用以下版本：“赋予新疆省实行民主制度、按各民族人口数量比例选举政权机关的国内自治权”。他主张在党纲结尾部分要展现该党对于对外政策的态度。其中在表述人民革命党对外政策立场时，他所建议的版本是：“本党将拥护中华民国政府的一切进步措施。本党认为必须加强与苏联的睦邻关系、发展经济联系，并与联合国其它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写给日丹诺夫的信中，苏斯洛夫认为尤苏波夫主张把人民革命党改为新疆人民党的建议是适宜的。在这位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处负责人看来，内务部及国家安全部党纲草案中没有充分考虑新疆当地特点以及该党开展合法活动的条件。他写道：“在某些地方，两个部的草案在向执政党条例方向偏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像是一部联共（布）党章（如关于党员责任的条款等等）。乌·尤苏波夫提交的党纲草案则更符合一个初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政党的要求”。

在创建政党的同时，苏联机构还注意扩大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新疆的活动，让协会开展新疆民众的工作。从三区革命运动开始一直到1946年3月，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禁止了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活动。该协会1946年的工作报告称，到1946年3月之前，仅在新疆做了极少量



的工作，原因是当时省内政局还十分紧张。中国政府禁止与苏联公民进行任何交流、阅读苏联书籍等。但随着中国中央政府和伊宁代表协商成功，从1946年3月后期开始，由于管制出现一些松动，当地民众有了与苏联人员及机构交往的机会。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新疆开展工作针对的民众主体是当地穆斯林。协会特派员乌尔马索夫经常与乌鲁木齐苏联总领事馆协调该协会在新疆省内的活动。就这样，从那时开始，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新疆的活动就不断扩展，不仅覆盖了乌鲁木齐，而且还覆盖了像喀什、伊宁、吐鲁番、托克逊、塔城、额敏、承化（即阿勒泰一译者）等等那些重要的穆斯林居住区。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新疆的任务是在当地民众、尤其是穆斯林中间，通过发放书籍和报纸，放映电影及举办展览会，提供卫生保健服务等途经扩大苏联的影响。同时，该协会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帮助新疆进步及民主人士与反动分子作斗争，并反对美、英影响向新疆渗透”。

1946年7月1日，按照中国中央政府与伊宁代表6月6日签署的协议，在新疆成立了联合政府。正如预料的那样，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张治中将军被任命为政府主席，而副主席是当地穆斯林人士——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与包尔汉。在此，哈斯木代表的是革命武装力量，而包尔汉代表的则是未参与革命的各界有影响人士。新政府成员应包括15名当地民众代表，其中8位应代表发生革命活动的几个地区。这8位人选实际上都已经征得苏联总领事馆的同意。……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加入政府的人员除了阿合买提江及包尔汉两人之外，获得厅长级职位的还有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乌斯满·巴图鲁、达列里汗·苏古尔巴耶夫、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拉西木江·萨比尔霍扎耶夫及赛福鼎·艾则孜。新联合政府第一次会议于1946年7月11日召开，会上通过了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

1946年下半年，处在苏联巨大影响之下的新疆北部三区的领导人，并没有忙于履行6月6日乌鲁木齐协议中那些涉及军事问题的条款。毫无疑问，这种忽视契约责任的态度是那些苏联机关有关指示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忽视在张治中将军1946年8月底访问伊宁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访问期间，张治中看到伊犁地区民族军部队中依然还在大量使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旗帜，并感受到当地对自己十分冷淡的态度。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写道，前暴动者……继续在使用自己的“国旗”；在8月底张将军访问伊宁期间，他发现暴动者的那些旗帜要多于中国国旗；一些中国人还感觉到，张也没有享受到新疆省政府主席应有的礼遇。

1947年春，新疆各地蔓延的示威和抗议浪潮开始逐渐演变成反对张治中将军的政府。无论是伊宁代表，还是苏联领导人，都对张将军与阿勒泰义军领导人乌斯满·巴图鲁建立秘密联系并成功使其投向中方的做法感到不满。1946年11月，乌斯满的几支部队开始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阿勒泰地区的军队发生武装冲突。调查证明，在阿勒泰地区活跃的几支乌斯满部队“经常获得乌鲁木齐中国军队指挥部的支持”。摆脱了苏联影响的乌斯满·巴图鲁已成为苏联在中国西部利益的严重威胁。鉴于此，1947年2月24日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除掉乌斯满及消灭其部队的决定：

“为了阻断阿勒泰地区行政长官乌斯满·巴图鲁·伊斯马伊洛夫针对苏联在新疆利益的敌对活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1. 责令苏联国家安全部通过其秘密渠道同意新疆民族军司令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中将与阿勒泰地区副行政长官（兼阿勒泰团团团长）达列里汗·苏古尔巴耶夫采取的针对乌斯满·巴图鲁匪帮的措施，并建议他们追剿这些匪帮，直至完全击溃和歼灭。

2. 责令苏联国家安全部通过同样渠道建议新疆政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向新疆政府提出将乌斯满·巴图鲁尽快清除出新疆政府并撤消其阿勒泰专区行政长官一职的问题，建议任命达列里汗·苏古尔巴耶夫为阿勒泰专区行政长官。将乌斯满·巴图鲁撤职的理由应解释为：他一直躲在自己的过冬地，不愿返回专区中心，没有采取措施维护专区的社会治安和秩序，尤其是没有打击在



其过冬地一带活动的匪帮，没能保护专区民众免受这些匪帮的劫掠。

3. 苏联内务部划拨下列军火供苏联国家安全部调配：(a) 步枪及重机枪子弹 100 万发（俄制）；(b) 轻机枪子弹 10 万发（德制）”。

决定将经过秘密渠道交付军需品的任务委托给了苏联国家安全部。决定中说：“将军火交给新疆方面需秘密安排，此事交由苏联国家安全部办理”。决定中各项任务的履行由莫洛托夫、阿巴库莫夫及马利克负责，而第 3 条则由克鲁格罗夫负责。

为了向北疆发生的事件提供实际支持并增强穆斯林民众进行斗争的信心，1947 年 2 月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朱马拜·沙亚赫麦托夫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提议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内建立一个维吾尔自治州。他在写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帕托里切夫的信中说：“哈共（布）中央委员会把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内成立维吾尔自治州的问题提交联共（布）中央研究和决定，该州包括塔尔迪库尔干州的潘菲洛夫区和奥科贾布尔区（相当于中国的县——译者）、阿拉木图州的奇利克区、恩别克什哈萨克区、维吾尔区、纳伦科尔区及科根区。成立维吾尔自治州的必要性是出于以下考虑：(a) 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的维吾尔人之中，民族团结及发展民族文化的愿望特别强烈。哈萨克斯坦维吾尔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上述地区他们居住相对集中，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点。成立维吾尔州将促进在形式上具有民族特点而在内容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维吾尔文化积极复兴，选拔维吾尔民族精英进入党政机关，改进维吾尔干部的政治工作，并根除维吾尔民族主义分子在国内外依据臆想的维吾尔民族不平等现象以及停止出版维吾尔报刊、关闭维吾尔学校的所谓论据进行反苏宣传的土壤；(b) 拟设之州各区的经济发展将会更有成效、更为迅速。这一点显得重要还因为，维吾尔州将与新疆伊犁专区接壤，那里是中国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的发源地；(c) 维吾尔州的成立，无疑会引起新疆三百万维吾尔群众的正面反响，使其民族解放运动趋于活跃，同时也会使解放运动更多地以苏联为导向”。

规划纳入自治州的那些地区生活着 2.3 万维吾尔人，在当地总人口中占比超过 20%。沙亚赫麦托夫认为，这个新的州将会变成吸引在哈萨克斯坦以及毗邻共和国境内生活的维吾尔人的中心，短期内该州人数就应会大幅度增加。规划中该州的首府将会是潘菲洛夫市（原热尔肯）。然而莫斯科没有积极接受这个提议。当时认为，无论是在哈萨克、还是乌兹别克、抑或是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成立维吾尔自治州都是不合适的。

## 二、麦斯武德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后苏联新疆政策的调整

1947年5月19日张治中辞去省政府主席之职，而取代他担任该职的是联合政府成员麦斯武德·沙比尔。张将军在辞去政府首脑职位后被任命为西北行辕主任。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同样也离开了自己的职位，其职务由艾沙·优素福·阿尔普特金担任。然而无论是苏联，还是联合政府中的亲苏成员，都对这些变更感到不满意。尽管张治中将军辞去了政府主席之职，但新疆的事情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他手中。根据苏联的指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以及政府中来自北部三区的左翼成员起来反对麦斯武德·沙比尔和艾沙·优素福。

按照莫斯科的指示，三区代表团拜访了张治中，反对以这种方式成立省政府。苏联发动一些地区的旧间谍网筹谋示威游行甚至挑起反对麦斯武德·沙比尔和艾沙·优素福的暴动。一些亲苏人士也开始印刷及散发批判两人的传单。尽管如此，麦斯武德·沙比尔还是开始以政府主席身份工作了，并逐渐罢免了那些在省府机关工作、持左翼思想的亲苏派官员，用民族主义人士取而代之。在麦斯武德·沙比尔掌权之后，苏联与新疆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更加冷淡。1947年6月在新疆-蒙古边境北塔山一带发生的武装冲突，不仅使莫斯科与新疆政府、而且还使它与中国



中央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将这些冲突描述成乌斯满·巴图鲁（已经受国民党控制）指挥的哈萨克部队6月2日入侵本国领土，蒙古军队经过艰苦战斗于6月5日将其赶出了国界。实际上，所发生之事是苏联意图强化新疆省内紧张局势并恶化与南京政府关系的一次尝试。

在麦斯武德·沙比尔政府成立后，苏联对新疆的新一轮政策也开始了。利用以前建立的间谍网，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正在想办法组织穆斯林民众进行反政府的活动。出于这个目的，苏联政府还向哈萨克、乌兹别克及吉尔吉斯三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下达了新的指示。1947年6月29日，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朱·沙亚赫麦托夫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提出加强在新疆地位的建议。他写道：“为了巩固穆斯林在北疆起义反抗汉人所获得的政治和经济成果，以及该省非汉民众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哈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将如下建议提交给您研究是可行的：在分散的民族复兴团体基础上依靠反汉的那一部分穆斯林群众建立共产党，将其命名为‘新疆人民党’，并采用经联共（布）中央认可的纲领和章程；这个党的日常的、非公开的领导工作由联共（布）中央实行；授权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共产党（布）中央与新疆人民党中央在确定的专区内一起进行相关的工作。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授权哈共（布）中央在与哈萨克斯坦领土相接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专区进行工作”。

关于成立“新疆人民党”的问题在1946年夏乌鲁木齐协议签署之后就已提出来了。而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乌斯曼·尤苏波夫当时就将自己对该问题的建议发给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处负责人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朱·沙亚赫麦托夫则就此问题直接呈请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沙亚赫麦托夫写道：

“我们认为建立一个15个人组成的新疆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是适宜的，其成员来自新疆非常知名的进步的穆斯林权威人士，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最近积极参加反汉武装起义的群众联系在一起，并依靠那些已从或正在从各个边境苏维埃共和国派往边界之外的共产党员顾问和教官。并据此原则组建新疆人民党在各个专区的专区委员会：首先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专区，而后再在新疆其它专区”。

沙亚赫麦托夫的大部分建议都与在新疆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有关。其中就有在新疆成立一个青年组织、大规模恢复各种民族文化教育组织活动等等。出于这个目的，朱·沙亚赫麦托夫建议在苏联驻伊犁、塔尔巴哈台及阿勒泰专区中心的领事机构中设二等秘书一职，该职务应派遣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工作人员担任；在阿拉木图，扩大面向新疆居民的、用维吾尔语印刷的科普、文艺、历史书籍及教科书的出版；安排从莫斯科、喀山、塔什干、阿拉木图方面播放维吾尔语无线电广播节目等等其它措施。建议末尾的第20条所列内容为：“为了把新疆的穆斯林吸引到苏联清真寺的爱国宗教发展过程中，并保障有影响的新疆穆斯林宗教人士在我们的国土上与中亚穆斯林宗教领袖的私人交往，应恢复热尔肯城清真寺中的合法礼拜活动（不做硬性要求）”。

沙亚赫麦托夫建议的施行与1946年6月6日中国中央政府和伊宁政府之间在苏联调停下所签署的协议相悖，也意味着苏联在该地区的政策活跃起来，这就使协议的履行受到了威胁。在朱·沙亚赫麦托夫致函日丹诺夫两周之后，1947年7月1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开始对新疆进行维吾尔语无线电广播的秘密决定。根据决定，该广播电台设在塔什干。

塔什干维吾尔语无线电广播一开始工作，麦斯武德·沙比尔政府就成了该节目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次播报中就讲道：“以前泛突厥主义的中心是安卡拉，现在它转移到了乌鲁木齐。在以前，像费特·科普柳留、比斯木·阿塔莱依等卖身给英国人，在土耳其发展泛突厥主义和泛图兰主义思想。现在，麦斯武德·沙比尔、艾沙·优素福和那些卖身于帝国主义者朋友们，开始在东突厥斯坦宣扬这些思潮”。这些节目公开表示了莫斯科对新疆省政府的不满。



苏联在 1947 年下半年决定重新积极实施自己在新疆的政策。为获取有关东突厥斯坦地区局势的详细情报并制订针对该省的新政治路线，1947 年夏，苏联领导人召乌鲁木齐总领事亚历山大·萨维列也夫回莫斯科。得知他要返回莫斯科的消息后，新疆政府前领导人张治中将军给总领事发了一封长信。在收到张治中将军信函的 5 天之后，7 月 12 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拉西木江·萨比尔霍扎耶夫也给苏联总领事亚·萨维列也夫寄来一封长达 4 页的信。由于伊宁领导人在发给苏联总领事的信中表达了不满，民众中开始蔓延一些谣言，称伊犁人士和苏联之间关系似乎已经恶化了。1947 年 8 月 19 日，张治中与哈斯木及阿合买提江等的信件从汉语及维吾尔语翻译过来之后，与同时发出的一份文件由苏联外交部远东一处副处长 T·斯克沃尔措夫寄给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情报处负责人 Л.巴拉诺夫。

鉴于新疆问题重新列上了议事日程，苏联也开始讨论进行与新疆相关的科学研究以及在苏联科学院一家研究所中设立相应部门的必要性问题。讨论期间，曾就设立研究当代东方及进行新疆问题研究的新研究所问题起草并发送了一份报告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动员和宣传局。报告指出：“新疆政局恶化以及当地生活的诸民族——维吾尔人、哈萨克、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要求我们仔细关注并深入研究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报告拟订要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历史、经济、地理问题，并建议在以下方面开展这些工作：

1. 新疆的自然地理特点，将新疆作为一个与苏联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统一的地理整体的组成部分；
2. 与中亚地区诸民族族源相关的新疆各民族族源问题，以及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途径；
3. 新疆历史及当地民族解放斗争情况，将其作为提高本土各民族爱国情感的源泉；
4. 新疆各民族民族文化问题，如语言，文学，民间口头创作，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等；
5. 新疆宗教问题以及利用该问题的机会；
6. 新疆经济，计划披露新疆的殖民地处境，封建残余统治情况以及借助发展与苏联经济的关系以实现崛起的前景。

鉴于双方关系已十分紧张，1947 年 8 月 26 日，伊宁代表宣布退出政府。8 月 29 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拉西木江·萨比尔霍扎耶夫及其他来自伊犁地区的代表团成员乘飞机离开乌鲁木齐，回到了伊宁。紧随他们之后，那些协商委员会成员也离开了乌鲁木齐。由于北部地区代表的这种行动，莫斯科也就失去了对麦斯武德·沙比尔政府的影响。因此，为了使新疆回到自己势力范围之下，苏联开始筹谋新一阶段的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就在 8 月 29 日这一天，政治局根据莫洛托夫的建议通过了“批准苏联部长会议所属情报委员会关于授予其正式名称——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经济研究委员会的提议”的决定。新成立的委员会所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新疆问题起草建议并将其提交政治局审定。在 9 月 10 日提交讨论的那些建议之中讲道：“为了防止新疆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被打垮并巩固穆斯林在反对中国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经济研究委员会认为必须采取下列措施：建议代表穆斯林的新疆政府成员——即从乌鲁木齐回到伊宁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包尔汉、拉西木江·萨比尔霍扎耶夫、赛福鼎·艾则孜、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等人，致函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和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1946 年谈判调停者），应在信中指出，他们离开乌鲁木齐是因为中国反动势力的猖獗，中国官员直接违反了 6 月 6 日协议条款以及当前令人难以忍受的政府中的情况”。

建议还指出，必须要提出这样的一些要求：尽快释放被捕的穆斯林人士；惩治在这方面以及在迫害进步人士方面有严重过错的汉人；麦斯武德·沙比尔辞去省政府主席之职；履行 6 月 6 日协议的所有条款。苏联领导人认为，在写给张治中将军及苏联总领事亚·萨维列也夫的信中应强调，如果履行这些要求，写信人就准备立刻返回乌鲁木齐并继续在张治中领导下在政府中工作。经济研究委员会建议政治局：“以‘为实现 1946 年 6 月 6 日协议而斗争’的口号，使乌鲁木齐



地区的吐鲁番绿洲已开始的穆斯林游击队反中国运动进一步活跃起来，同时在 1944-1946 年反中国起义大多数参与者生活的新疆南部地区（阿克苏、库车及喀什地区）安排部署游击运动”。

建议主张公开宣布新疆南部发动反中国斗争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政府在喀什大规模逮捕当地穆斯林，以及中国政府日益蛮横专断地对待当地民众。经济研究委员会还确定了新疆南部游击运动的领导人。建议中讲道：“为了领导新疆南部的游击运动，应将目前暂时生活在乌兹别克及塔吉克共和国境内、前起义运动的那些领导人（如塔基穆拉耶夫·卡拉万绍-别克、塔基穆拉耶夫·阿丘尔-别克、米尔扎·阿赫迈多夫·塔依尔-别克、阿不都克里莫夫·穆赫塔尔等）秘密派往那里。应向新疆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弹药援助，将这些东西从苏联境内秘密地调拨过去”。建议第 3 条谈的是尽快对 1.2 万前东突厥斯坦军队提供武器及技术装备的问题；第 4 条则希望成立一个组织来领导新疆的民族解放运动。建议中写道：“建议新疆穆斯林进步运动领导人成立一个总部设在伊宁的‘新疆和平促进协会’，该协会应在为实现 1946 年 6 月 6 日协议而斗争的口号下开展工作”。同时应事实上负责新疆境内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计划将来一有合适机会就将协会变成一个合法政党，由政党领导民族解放运动，指导每一斗争阶段的工作。与此同时，建议还认为应当建立该协会的各专区、县的机构，将进步穆斯林人士、宗教界代表、部落长老等等吸纳到其阵营之中。

在经济研究委员会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并考虑到当前的局势，1947 年 9 月 10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份“关于新疆”的决议，由 6 条内容组成。决议中说：“责成苏联内务部（克鲁格罗夫同志）：（a）调拨以下数量的俄式（老式）以及缴自德军的武器和弹药供经济研究委员会安排：步枪 9000 支，重机枪 70 挺，轻机枪 300 挺，连用迫击炮（即 60 迫击炮——译者）40 门，反坦克枪 40 支，手榴弹 18000 枚，步枪子弹 800 万发，连用迫击炮弹 15000 发，反坦克枪子弹 15000 发。武器和弹药应运送到委员会所指定的地点；（b）命令边境机构无阻碍地放行持有委员会通知单的人员和物资；（c）在必要情况下，为委员会安排边境飞行中队的飞机用于其苏联境内的飞行”。根据决议第 3 条，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受命向经济研究委员会调拨汽车运输所需零件；零件运送由苏联内务部负责。政治局决定特别提到：“责成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及塔吉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在经济研究委员会就新疆实行所拟定措施期间向其提供必要的协助”。

决议还建议：“武器不应立刻交付，而是根据需要以及马利克同志与费多托夫同志的协商情况办理”。决议把组织管理及政治措施的执行交由土库曼斯坦内务部长弗拉基米尔·叶格纳洛夫负责，此人是第一阶段新疆事件——即新疆北部革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他作为人选是由苏联部长会议情报委员会副主任彼得·费多托夫在给莫洛托夫的一封电报中提出来的。该电报写道：

“遵照您的指示，我与克鲁格罗夫同志及奥戈尔措夫同志讨论了派谁去新疆开展组织管理-政治活动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推荐候选人叶格纳洛夫·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少将请您审核……。目前叶格纳洛夫是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务部长。叶格纳洛夫的副手，我们认为应调派奇巴耶夫·彼得·安德烈耶维奇上校担任，由他负责与我国驻新疆情报机关的联络工作。安德烈耶维奇是国家安全部远东情报处前任处长，也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情报人员，参与了 1945-1946 年间在新疆的诸多行动，目前在我委员会负责新疆事务”。为了在新疆组织新的游击运动及开展政治活动，费多托夫认为应当征求乌兹别克斯坦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意见，派遣干练的国家安全机构人员进入新疆。他给莫洛托夫写道：“为了确保政治工作在伊宁的开展，宜调派一位乌孜别克族的相关人员。如果您对此表示同意，请允许我与乌斯曼·尤苏波夫联系，和他商讨如何调派此人的问题。我们将挑选 15-20 名干练的工作人员供上述同志调遣，可将工作人员派到新疆境内，假扮当地人秘密执行调运武器任务，监督武器为我方利益服务的情况并通过我方在伊宁人中的代理人员解决其它各种问题”。

政治局依据经济研究委员会建议于1947年9月10日通过的秘密决议，制订了落实决议的组织管理-政治措施，确定了执行党的决定的主要机关，批准了协调这场民族解放斗争名义之下的分裂运动的领导干部人选，以及派遣苏联国家安全机构别动队前往东突厥斯坦各个地区……。所有这些做法标志着政治局1943年5月4日关于在东突厥斯坦部署分裂运动的决议在新的政治局势下又回归日程。苏联为发起新一波分裂运动制造各种条件，使中国中央政府面临新一轮的“神经战”。但是，无论是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建议，还是政治局通过的秘密决定，都再没有出现恢复东突厥斯坦国、使用其标志符号的提法。该地区管理是由联合政府中伊宁代表所成立的组织——“新疆和平促进会”（疑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1948年8月成立，阿合买提江任主席——译者）来实施的。经济研究委员会起草建议，政治局通过新疆问题秘密决定，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谈判中断，新疆事件在时间上刚好赶上新一阶段国内战争的开始，这些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现象。

然而，与1944-1946年间时期不同的是，新疆北部地区在1947年秋还没有实现统一。乌斯满及其哈萨克战士此时已成为令各苏联机构人员头疼的新问题。尽管苏联领导机构在1947年2月就下达了清除乌斯满及歼灭其所率部队的命令，但乌斯满却为恢复自己对阿勒泰地区的控制展开了更为积极的行动。虽然对“新疆锡业”及其它企业构成了威胁，“苏联内务部依然还是命令机动支队（即部署在伊宁及可可托海的内务部边防军机动支队——作者）队长加强对可可托海勘察队基地的保护和防卫，不要参与乌斯满和民族军队的作战行动”。1947年9月，乌斯满的部队（1500人）及卡里别克的部队（900人）对阿勒泰地区发动突袭。乌斯满突然占领可可托海（9月3日）及阿勒泰首府承化（9月12日），迫使负责执行政治局决定的阿勒泰地区领导人达列里汗从城中逃了出来。负责新疆政局事务的苏方工作人员认为这些军事行动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国新疆省政府在人员、武器、装备及粮食方面向乌斯满提供了帮助。这些帮助主要与新疆国民党军队司令宋希濂将军有关。

然而乌斯满品尝胜利果实的时间却并不长。9月底，达列里汗来到塔城，要求增加援助以与乌斯满部队作战，塔尔巴哈台地区也开始征召志愿兵，配发武器并交由达列里汗指挥的两个骑兵连以及几个步兵营。除此之外，根据莫斯科下达的指示，加入清除阿勒泰及塔尔巴哈台地区乌斯满部队行动的还有苏军的几支部队。10月16日，约100辆卡车运载着3000多名重装士兵，由6辆坦克协同驶入阿山北部地区。除了苏联，伊犁部队并没有其它获取军事装备的渠道，尤其是坦克，目前拥有的那些坦克并不能说是他们在起义期间从政府部队手中夺取的，因为政府军那里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塔尔巴哈台专区政府的常备部队和新成立的部队以及苏军一起发起进攻，在10月下半月夺回了对承化的控制。乌斯满部队则撤退到山里。美国领事认为，伊犁民族军的此次胜利没有苏联的帮助是不可能的。宋希濂将军在与包懋勋的交谈中公开声称：尽管可能有红军部队，但这些武装进入这个地区主要是为了驱逐哈萨克部队并收回对富蕴（即可可托海——作者）钨矿的控制。但是，苏联欲借助蒙古国除去乌斯满的计划最终却没能成功。

在将乌斯满武装部队从矿产资源丰富的阿勒泰及塔尔巴哈台地区驱离之后，新疆北部地区的苏联内务部队及国家安全部别动队也回到了自己的防御阵地。在此期间，为确保三个革命专区的“安全”，苏联认为必须加强伊宁民族军的人员组成并巩固其物资设备基础。在苏联顾问看来，根据1946年6月6日协议改组成立的1.1-1.2万人的民族军部队应当维护三区的安全，使之免受乌鲁木齐方面的侵犯。鉴于乌斯满的军事威胁已降到最低限度，1948年2月14日，弗拉基米尔·叶格纳洛夫给苏联内务部长C·克鲁格罗夫发去一份“关于将其所率领的内务部人员召回常驻服务地”的电报。为获得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克鲁格罗夫于1948年2月18日将此电报转给了莫洛托夫。苏联领导人同意了叶格纳洛夫的建议，并从1948年春开始主要关注整体加强北部专区的军队以及当地政权机关的问题。





### 三、苏联帮助中国共产党接管新疆

从 1948 年开始，苏联顾问们计划逐步将始于伊犁地区的当地民众民族解放运动融入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之中。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终止之后，中国国内战争进一步趋于激化，在此期间，蒋介石已失去了对国内一些重要地区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很快开始的决战阶段也波及到了新疆。听命于中国中央政府的麦斯武德·沙比尔政府，在遭遇莫斯科及其控制的“民族力量”巨大压力之后，开始实施更激进的反苏政策。因新疆省政府认为“所有祸害”都“源于俄罗斯”，所以它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反苏、反共、反三区革命委员会”的社会组织。在该组织之下还组建了一些军事化的青年团体。由于这些团体主要由哈萨克族青年人组成，这些团体的领导权就交给了乌斯满。一场残酷打击乌鲁木齐及其它政府控制地区内苏联代理人的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在中国国内以及新疆边境地区局势均日趋紧张之际，对北部三区的管理不可能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考虑到这种情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 1948 年 4 月 24 日通过了“关于加强伊犁、塔尔巴哈台及阿勒泰三专区政治经济状况的有关措施”的决定。决定中说：“为了加强行政及军事管理并改进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及阿勒泰地区政治经济状况，认为必须采取以下措施：建议哈斯木·阿合买提江（新疆政府副主席）在伊宁召集三区各地正、副行政长官及财政、经济机构领导人开会商讨当前的形势。此次会议上应成立一个由 5-7 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作为负责整个三区行政管理及经济事务的领导机关，但该委员会不要公开走向前台。为了不让中国政府方面知道该机构的真正使命，应将其称作‘财政及经济状况研究及改良委员会’”。决议写道，如果中国政府方面质疑成立该委员会的原因，应答复：“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制订措施征收维护部队及行政管理机构所必要的货币和物质资料，并对此进行监督，因为中国政府迄今没有划拨这些资料，而此种做法已违反了 1946 年 6 月 6 日协议的相关条款”。这份文件建议赋予委员会对三区政治及经济生活进行监督的权力，其中特别讲道：“赋予委员会监督行政管理机构政治及经济活动的权力，并有权就这些问题下达整个三区都必须遵守的、非公开的指示”。

苏联领导机构建议从新疆民族解放运动拥护者中选出可靠的人来组建委员会，与此同时却认为不宜将伊犁地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与伊宁武装部队司令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吸纳进委员会。莫斯科方面认为，只需始终把这两个人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即可，不必在委员会之内担任任何正式职位。委员会在三区境内的工作应当包括：制订统一的财政及实物税制度；监管比新疆其它地区更低的税收水平；确保军队、国家机构、教育及卫生部门所用物质资源的征收；筹划整个三区 1948 年的预算；为军队及国家机构拟订人员编制、明确工资标准等等。由于这些措施的施行，1948 年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境内市场上的物价只是新疆其它地区物价的五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

决议规定要成立“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以该同盟名义发布一份“告全省人民书”，并确定拟提交苏联政治局批准的呼吁书文本。苏联领导人认为应该让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及伊·穆努诺夫负责该同盟的领导工作。政治局决议第 3 条说：“要用当地工作人员的力量肃清在三区活动的乌斯满分子及中国政府代理人。为了动员人们积极与乌斯满分子及中国政府代理人做斗争，应在各地行政主管部门之下设立‘强化法治和秩序委员会’，吸收最可靠的氏族长老及宗教界人士加入此会。这些委员会的职责是听取各类拘押案件的调查结果并根据结果做出决定，随后再由行政长官对决议予以审核”。苏联政治局这份决议的第 4 和第 5 条则与工业及经济问题相关。根据这些条款的内容，苏联认为有必要在伊宁成立一家“伊犁工贸股份公司”，赋予该公司在开展内、外贸易活动方面的特权，在该公司之内组建各类合作组织，吸纳可靠的人加入公司，其中 1 名或

2名是苏联专门为该公司派遣的人员。为此，苏联外贸部部长阿·米高扬得到命令，在1948年9月1日前向“伊犁工贸股份公司”调拨小型石油工厂设备、电话电报及医用器械、药品，条件是以此交换价值150万卢布的原料、畜牧产品以及其它资料。决议最后一条责令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尤苏波夫及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沙亚赫麦托夫：“紧急找出那些来自新疆、已落户于共和国境内并受过教育的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及柯尔克孜人，以便让他们回到新疆加强三区的行政管理机构。将其中最具有学识及最合格的人员，经过与费·弗·库兹涅佐夫（费多尔·库兹涅佐夫，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下设的情报委员会副主任——作者）协商，派到新疆去工作。乌兹别克斯坦及哈萨克斯坦国内的学校，为那些在苏联求学的新疆青年开设专门的班级，培养医生、教师、农艺师、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其它专业的骨干，以便将来在新疆工作之用”。

这份斯大林所签发决议的执行事宜，由莫洛托夫、库兹涅佐夫、米高扬、尤苏波夫及沙亚赫麦托夫负责。与该决议一起，政治局还通过了4页内容的《告全省人民书》文本。这份呼吁书说：新疆各穆斯林民族长期遭受压迫和剥削，解救他们需要全体民众的团结和友谊，保持1944-1946年革命的成果；事实已多次证明，必须捍卫1946年协议中的民主条款。呼吁书还特别提到：“但目前依然还是敌视人民的那些分子在掌权，这些人想剥夺人民历尽艰辛得到、并被中华民国政府承认的自由。在一些掌权人物的支持下，草原恶狼乌斯满及其强盗匪帮曾经干过且现在仍在继续的那些突袭抢劫、对和平民众的暴行、对妇女儿童杀害、横行霸道及恣意妄为等等，就说明了这一点。新疆人民不会忘记卡里别克方面背叛人民事业的行为，他是乌斯满的同伙，也是如乌斯满本人一样的暴徒”。为了建立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建设一个各民族自由友好的社会，呼吁书宣布成立“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呼吁书结尾称：“‘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依靠当地人民支持、履行人民意志，肩负着为人民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伟大而神圣的使命。‘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将尽一切努力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所有进步的、真正民主的措施……。全省各专区、县、乡、村也将组建成立具有同样任务的地方同盟组织”。所有人，无论其性别、民族、信仰、职业及社会地位，都可被吸收为同盟成员。

1948年夏，“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的工作开始具体付诸施行，政治局根据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建议于4月24日所通过的决议认为，成立该组织是极其必要的。同年7月，根据人民革命党、革命青年联盟、自由协会及其它社会组织的提议，在伊宁召开了各民主力量、团体及协会的代表大会。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当前政局及各民主组织和团体任务”的长篇报告。而后，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的决议。该组织中央委员会由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领导，成员包括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达列里汗·苏古尔巴耶夫、萨格杜拉·赛甫拉也夫等等其他人。代表大会发表了“告全省人民书”，其文本已在4月24日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审核。发表之时，文本中与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有关的12条内容均未做任何变动。该呼吁书中的主张有：言论、出版、集会及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权利平等；以选举的方式组成地方机构，并吸收广受当地民众信赖的人士加入其中；人民对行政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成立人民教育协会；确保书籍印刷、期刊出版使用民族语言；开设用母语进行教学的小学、中学及职业技术学校；诉讼程序采用民族语言；消除性别歧视；扩大医疗机构网络；向贫穷民众阶层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改进农业土地的使用；发展畜牧业，改良土壤；扩大牧场用地以及解决其它问题等。

由于同盟是按苏联计划成立起来的，驻新疆苏联机构也就积极参与了其创建工作。它们的参与促进了同盟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大众化。仅一年之后，同盟在伊犁、塔城及阿勒泰三个专区就联合了27个县级和755个基层组织，成员超过了5万人。同盟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当时的公开演讲、文章及信件中坦率表达了在给予最大限度自治权的条件下继续让新疆成为新中国



一部分的想法。

1948年12月，苏联外贸部部长阿·米高扬，根据政治局4月24日的决议，就苏联与新疆贸易的主要方向表述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并将它报给了斯大林。他写道：“今年11月底，一些著名的乌鲁木齐商人多次来找我国贸易代表机构，要求向苏联出售毛料、生丝、皮料、皮货以换取苏联的商品，同时这些人还说，他们能够获得新疆省政府对苏贸易的许可。中国人对与我国贸易如此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目前在他们控制的新疆地区正在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因此可以预期，他们一定会向我们做出让步，而我们则以我方能够接受的条件为基础，协商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米高扬认为：“……继续推迟就谈判问题做出决定是不应该的，因为继续拖延下去未必会对我国有利。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恢复将进一步促进和巩固我国在新疆的地位，使我国与新疆民众的边境贸易以及苏联冶金工业部在新疆伊犁和阿勒泰边境地区进行的稀有金属开采活动合法化”。他说，与新疆经济关系的基础不仅仅是石油、锡和钨矿，而且还有稀有金属。部长认为，所有在新疆开采的有色及稀有金属，除了留下满足当地需求的必要数量之外，都应运到苏联境内。因此，米高扬建议立即开始与新疆省政府的谈判，谈判工作交由乌鲁木齐苏联总领事亚·萨维列也夫及苏联驻新疆贸易代表A.伊弗钦科夫负责。然而一些苏联机构，尤其是苏联外交部，却认为现在开始与新疆政府就恢复经贸关系问题进行谈判是不适宜的。比如，外交部远东一处处长尼·费多连科在向副部长安·葛罗米柯报告时写道：“当前中国国内政局对国民党极为不利，不适合我方在新疆经贸合作谈判问题上采取主动。若这样做的话，可能就会被视作对南京政府在政治上的支持”。

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从1948年年底开始走向公开化，而它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施压则进一步加强。这些施压手段之中有一些就直接与新疆有关。曾试图调解共产党和国民党避免发生内战的张治中将军，此时继续以省的行政领导人及西北地区中国武装部队指挥部总司令官（张治中曾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译者）的身份控制着新疆。共产党对他态度不坏，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甚至“称他为自己的朋友”。他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的军事、政治发展进程，目睹获得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所取得的优势，也想在新的政治情况下抓住机会保持对新疆局势的影响力。

此时，对麦斯武德·沙比尔政府不满的苏联代表，秘密派遣前联合政府成员、“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领导机构成员包尔汉前往张将军的指挥部。包尔汉对将军说：中国共产党的士兵正在向中国西北地区推进。如果他能为防止该地区被占领而断绝与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联系，而且与中国共产党就不派部队进入东突厥斯坦地区达成协议，那么苏联将提供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来加强该地区共产党的地位并支持其独立状态。在这一问题上，包尔汉建议张将军首先“解除麦斯武德·沙比尔、秘书长艾沙·优素福·阿尔普特金的职务，并召回指挥在东突厥斯坦的国民军司令宋希濂”。时任麦斯武德·沙比尔政府秘书长艾沙·优素福·阿尔普特金回忆说，张将军与苏联驻南京大使甚至就此问题达成了一些秘密协议。根据这些协议条款，苏联保证帮助中国西北地区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培养干部，建设空军，发展通讯，促进农业及加工业，并承诺在必要时派遣相应数量的部队进入该地区。在动身往南京之前，张将军向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通报了自己对替换新疆政府主席的看法。在乌鲁木齐领事区为苏联外交部起草的一份报告中讲道：“在去南京之前，张治中对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同志说，他准备撤消麦斯武德主席之职并委派深得伊宁人信任、同时又与汉人保持密切关系的包尔汉来担任该职”。这样，根据协商结果，张治中将军在1948年年底和蒋介石见了面并对他说：“我们作为中国民族主义者，不得不投入全部精力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生死之战，而俄国人利用这个机会，还可能会在伊犁暴动分子的帮助下占领其他专区。为了防止俄国可能占领新疆，应从新疆召回以反俄倾向而著称的部队司令宋希濂将军，并委派性格较温和的陶峙岳取代其职。更符合我国民族利益的还有任命包尔汉来替换麦斯武德·沙比尔，并让刘孟纯回来取代艾沙·优素福之职”。



此时本来就处境困难的蒋介石，也正在寻求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机会。因此，张将军的建议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中国政府首先在 1948 年 12 月批准了将宋希濂从新疆军队司令职位上召回的命令，任命陶峙岳将军代替其职。陶将军千方百计想办法展现自己对苏联的友好态度。而后他会见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沙比尔并对他说，为防止苏联占领该省，中央政府似乎要将他以及几名政府成员撤换下来。1949 年 1 月 10 日，即蒋介石向苏联提出在与共产党谈判中担任调停人的请求 2 天之后，陶将军解除了麦斯武德·沙比尔的省政府主席职务。与此同时，麦斯武德·沙比尔拒绝了南京政府任命他为中国驻伊朗大使的建议。以亲苏倾向而著称的包尔汉被任命为政府主席。任命他为政府主席让苏联驻新疆机构以及莫斯科的苏联领导人非常满意。包尔汉支持以自治为条件将新疆留在中国版图之内。由此可见，这次任命标志着莫斯科支持的伊宁集团掌握了新疆的政权。

在收到南京政府有关调停问题的提议之后，同时根据苏联外交部提交的报告，政治局在 1949 年 1 月 14 日的会议上讨论了中国国内局势。会议以“绝密”方式批准了斯大林发给毛泽东的密电。鉴于毛泽东正准备前来莫斯科，斯大林在这封电报中建议毛泽东推迟此行，由自己派遣一位政治局成员前往中国。1 月 17 日莫斯科收到毛泽东的回电。在电报中，毛泽东同意斯大林有关暂时推迟访问莫斯科的意见，并对派遣一位政治局成员到中国的想法表示欢迎。关于见面地点，毛泽东说：“最适合政治局成员前来的地方是石家庄。这个地方相对封闭，而且从这里可以直接前往我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在获悉毛泽东的回电之后，斯大林将中国之行的秘密任务交给了阿·米高扬，但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此，米高扬于 1 月 26 日离开莫斯科来到远东地区“了解千岛群岛及勘察加半岛的渔业情况”。1 月 30 日，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此次会谈讨论的问题有：“中国军事形势”，“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错误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等等。

首次谈论有关中国穆斯林的问题，是在 2 月 1 日米高扬与周恩来会谈的时候。对米高扬有关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会不会提某些要求这一问题，周恩来回答说：“穆斯林民众想获得的是自治权。如果我们给予他们自治权并小心处理其宗教问题，他们会和我们合作的”。米高扬问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的情况如何，周恩来指出：“中国这个地区有许多不同的、还处在落后发展水平的少数民族，其中仅有一些人达到较高社会层次”。有关新疆的问题在 2 月 4 日政治局代表与毛泽东会谈期间才充分得到了讨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回答米高扬问题的时候，阐述了自己的民族问题观点。在关于此次会谈的报告中，米高扬写道：“我转告毛泽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用给予少数民族独立的方式而过分表现自己，这会造或在共产党人掌权时减少中国的领土。给少数民族的应该是自治权，而不是独立。毛泽东对此建议感到高兴，从他面部表情来看，他是不打算让任何人独立的”。随后，就在这一天，双方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讨论了新疆问题。米高扬在 1960 年 9 月 22 日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撰写了一份关于他 1949 年 1-2 月中国之行的详细报告，其中是这样描述中共领导人对新疆问题表现出的兴趣的：“毛泽东怀疑我们在新疆的意图。他说在新疆伊犁地区有不服从乌鲁木齐政府的独立运动，但同时那里也有共产党。他讲道，1945 年在重庆与白崇禧会见时，白崇禧告诉他，伊犁地区的暴民拥有苏联生产的火炮、坦克和飞机。我明确向毛泽东声明，我们不支持新疆民族的独立运动，不但如此，我们对新疆领土也没有任何野心，我们认为，新疆是、而且应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然，米高扬是以苏联领导人特有的自信在这样的场合说假话。要知道，他不仅参加了制定了关于新疆的秘密决议的所有那些政治局会议，而且还是这些决议一些条款的执行者。在与毛泽东会谈期间，米高扬指出：“这场运动是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引起的，政府不愿考虑那些民族的民族特点，不给他们自治的权力，不允许发展民族文化。如果能给新疆各民族自治权，那么未必会有独立运动的温床……。我们一直支持发展与新疆的经济合作及贸易，正如现在发生的那样，正如以新疆张



治中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所主张签署的协议那样”。就此问题，毛泽东强调：“他们的意思是使新疆整体自治，就像内蒙古一样，它已经是一个自治区了”。

与米高扬交谈期间，毛泽东对新疆石油储量的多少特别感兴趣。为了满足其兴趣，米高扬说：“在盛世才时期，我们开采并加工了大量的石油，由于没有输出的交通工具，这些石油都用于满足新疆省内的需要”。另外一个让毛泽东感兴趣的涉及新疆的问题是，能否实现在东突厥斯坦境内将中国铁路与苏联铁路连结起来的想法。毛泽东将这条铁路视为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交通线。因此，毛泽东问道：“能否修建一条铁路将中国铁路与苏联铁路通过新疆连结起来？如果爆发新战争，这将对两国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样的战争中，中国当然会和苏联站在一起。假如满洲地区遭遇军事威胁，这条铁路就将是中國作战部队的一条重要补给通道”。但米高扬却不能给予毛泽东任何答复，因为他不知道斯大林对此问题的看法。2月5日，他给斯大林发电报报告了这一问题。米高扬从中国返回之后，斯大林才在讨论他此次中国之行成果时表示，连结苏中两国的铁路更适合经过蒙古修建。鉴于此，政治局代表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后来去信写道：“……应经过蒙古国修建铁路，因为这里已经是一个人民共和国，且这样修铁路会更短、更便宜，而修建新疆铁路则是摆在第二位的”。

2月6日，在毛泽东与米高扬又一次会谈的时候，中国穆斯林地位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话题。毛泽东说：“我们承认穆斯林的民族地位，我们从来不赞同国民党压迫中国穆斯林民众的政策，因此也认为应给予他们中国国内的自治权，中国目前共有多达3000万的穆斯林民众”。在此次交谈期间，中国共产党首脑简要阐述了自己针对新疆的规划。他指出：“新疆生活着14个民族，人口总数约300万。新疆具有巨大战略意义，并在经济上将我国与苏联联系在一起。根据我方计划，我们将在1951年进入新疆”。但斯大林却不同意毛泽东按照其在中国推进共产主义的方案，打算在1951年才进入新疆的计划，他在1949年6月就必须加快在新疆建立共产党体制一事给中共领导人发去一封专电。苏联领导人在这封电报中写道：“我方建议必须对新疆予以重视，这里地下蕴藏着石油，在这里您也能得到棉花。您没有石油将会十分艰难。如果能尽快开始在新疆的工作，那么经过2-3年就能拥有自己的石油。将来可以从石油开采及加工地区铺设输油管到郑州车站，而从郑州您既可以走水路、也可以走铁路将石油运往国内各地。因此，您不宜长时间推迟占领新疆”。

当斯大林于1949年6月在莫斯科接见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时，他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会见中国共产党人时，斯大林提到新疆在经济及战略上对新生政权的重要性问题。他这样向中方代表团建议说：“占领新疆一事不应再拖延，因为拖延会招致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预。英国人可能将穆斯林挑动起来，其中也包括印度的穆斯林，使针对共产党的内战继续下去，这是不希望发生的。另外新疆还有丰富的石油矿藏和棉花，这是中国急需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坚持要尽快占领新疆，是因为他对泛伊斯兰主义可能在中东地区蔓延感到担忧。人口主要为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在1947年8月的建立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可能性。苏联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普遍认为：一个新穆斯林国家在中东出现是由于英国加强了阴谋的实施。在斯大林看来，英国人可能会将这些做法也用于东突厥斯坦。为了排除这种威胁，斯大林认为重要的是要在将来改变新疆的民族-族群结构。他对中共中央建议说：“新疆的汉族人口现在不超过5%，在占领新疆之后，为全面开发这个广袤而又富饶的地区并加强中国边防，应通过汉族移民将汉族人口的比例提高到30%。总之，为加强中国国防，应让所有边境地区都住满汉人”。与此同时，他不同意中方代表团成员的意见，代表团认为暂缓占领新疆是由于穆斯林将军马步芳率领的国民党军队在西北地区。对此，斯大林说：“你们高估了马步芳的力量，他的骑兵是可以很容易被炮火消灭的。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给贵方提供40架战斗机，它们可以迅速打垮、驱散这些骑兵”。



刘少奇居留莫斯科之时，他以代表团名义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及苏中关系”的长篇报告，并于7月4日将报告交给了斯大林。报告阐述了中方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中方对斯大林有关新疆建议的态度。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写道：“我们是想尽快地解放新疆，但清除通向新疆道路上的敌人、确保运输畅通对我们来说是一大困难。必要的交通工具不足也是一个大难题……。如果我们能克服这些困难，那就可以使解放新疆的时间大大提前”。在莫斯科双方谈判期间，斯大林建议中国共产党紧急派遣一位代表前往新疆与伊宁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及新疆进步知识分子建立联系。他认为应当从一开始就让这位代表留在新疆监控局势。刘少奇说，这样的代表可以由代表团成员邓力群去担任，但指出需要和毛泽东协商该问题。谈判过程中，斯大林与中方代表团商定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就包括邀请东突厥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团参加1949年9月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大会。此外，双方约定处于苏联控制之下的北部三区左翼势力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并，中方同意将三区民族军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夏，在莫斯科与以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争议问题。为解决问题，刘少奇向毛泽东做了汇报。7月25日，毛泽东就这些问题给代表团发来一封电报，并要求将电文内容告知斯大林。他在这封电报写道：“我们同意派邓力群到新疆，任务是在那里建立起与北平的无线电联系”。无论什么情况，毛泽东认为他的部队最早赶在1950年1-2月份前占领新疆是最为现实的。7月29日，苏联政治局根据刘少奇建议，通过了在伊宁设置为中国国民党代表处服务的无线电台并调派一架专机运送新疆代表团赴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秘密决定。决定中说：“满足中方代表团领导人刘少奇有关新疆问题的请求。为此：(a) 责成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及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费多托夫同志）在伊宁设置一个专用无线电台，为电台配备必要的技术设备及提供操作人员，并根据刘少奇同志的请求，从在莫斯科为中方代表团服务的人员之中派遣1位负责人、2名无线电话务员、1名译电员及1名翻译用于伊宁无线电台的运行；(b) 责成苏联民用航空总局（贝杜科夫同志）调派一架专机将新疆民主地区代表送到赤塔，以便他们接下来前往北平”。政治局委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维辛斯基以及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瓦冈·格里高利扬负责执行该决定

苏联和中共领导人都关注伊宁的“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负责人参加将于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情况。为此，他们发去了一封由毛泽东签名的邀请函。此时的毛泽东称新疆三区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北平也因此邀请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代表。像政治局那样重要的苏联机关甚至还决定调派一架专机送他们飞往北平。该代表团成员包括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里汗·苏古尔巴耶夫、乌鲁木齐中苏友好协会负责人罗志这些知名人士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知道，这些人此时还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持动摇和观望态度。政治局秘密决定规定“……将新疆民主地区代表送到赤塔，以便他们接下来前往北平”，大家知道，代表团于8月22日从伊宁抵达阿拉木图，再从那里飞往北京。然而，运送代表团前往中国的飞机8月25日却在伊犁库茨克地区遭遇令人费解的事故，机上所有17位乘客全部遇难。

中国新华社当天就对此事做了报道。虽然苏联驻伊宁领事向“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的赛福鼎·艾则孜不断通报代表团从阿拉木图到新西伯利亚、再从那里到伊犁库茨克的飞行路线，但从伊犁库茨克起飞后有关代表团命运的情况他却什么都没有说。到了9月3日，他才将艾则孜叫到自己那里，向他宣读了从莫斯科收到的一封急电。电报称：“载有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所率代表团的飞机从伊犁库茨克起飞后不久，由于恶劣天气，很快在后贝加尔斯克山区不幸撞山坠毁；机上17人全部遇难”。曾任省政府秘书长的艾沙·优素福·阿尔普特金认为，这起事件的发生是因为莫斯科需要将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有关的“苏联痕迹清除掉”。在他看来：



“中国共产党人不知道俄国人与反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党的伊犁起义者之间所达成的那些协议情况”，因此出现了谋杀这样的结果。伊宁按莫斯科指示很快就组建了一个新的代表团前往北平。9月8日，由赛福鼎·艾则孜、阿里木江、涂治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启程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

1949年夏，新疆境内再次紧张起来。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占领新疆已被中国共产党纳入其近期计划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这一天，陶峙岳将军来到酒泉，邀请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10月13日，东突厥斯坦城市哈密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在这些天，为了占领新疆首府，新政府主席毛泽东紧急致电斯大林，请求派遣飞机使其能够调运一个师到乌鲁木齐。10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满足毛泽东同志请求的决议。在给中国领导人的回电中讲道：“我们认为您使用飞机从酒泉调派一个师到乌鲁木齐的决定是正确的。关于您请求运送1000吨航空汽油到乌鲁木齐以及其中200吨到哈密，现通知如下：我们可以用汽车把这些燃油于11月1-3日间运到乌鲁木齐和哈密。我们需要知道您的看法：我方载燃油车队在从伊宁经乌鲁木齐到哈密这一路线上能否畅通无阻。用于加强乌鲁木齐和哈密机场服务的人员以及您在自己电报中请求的、五架由彭德怀同志支配的备用运输机，我们将按您指定的时间如期提供到位”。双方通过这些电报交流一周之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就进入了乌鲁木齐。新疆其余那些大城市于较短时间之内也纷纷移交到解放军手中。在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亲自邀请张治中将军担任领导之职。1949年12月17日，新疆成立了新的省政府以及新疆军区，包尔汉再次被任命为政府主席，而北部三专区作为分离的区域单位则被撤销。分布在这些地区的民族军部队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12月28日，回到北京的彭德怀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关于新疆情况的详细报告。

就这样，在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获得胜利之后，新疆的“苏联篇章”也走到了尽头。对于新疆北部地区1944年11月那些革命事件的秘密，莫斯科选择了向世人、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保密。这些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也因伊尔库茨克城外的空难而被清除。苏联最终将曾被用作向蒋介石政府施压工具的新疆北部三专区以及整个新疆省交给了北京政府。新疆历史新的一页也从而开始。1955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该地区的这个身份一直沿用到现在。

## 【报刊文章】

### 印度取消印地语强制教学

《环球时报》2019年6月4日第4版

《环球时报》驻印度特派记者 苑基荣

“这就是在给印地语开后门！”印度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党一名议员指责印度中央政府上月31日发布的2019年国家教育政策时说。据《印度教徒报》3日报道，该政策规定，印度非印地语地区的课程体系必须包含当地语言、英语和印地语，而印地语地区除了印地语和英语外，须再加一种现代印度人的语言。但该法案在非印地语地区遭到强力反对。无奈之下，印度中央政府将该规定改为“这3种语言中至少一种达到可读写程度”。

